

觀念史研究

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金觀濤、劉青峰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責任編輯：朱敏翎、張志偉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17563-1-2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新界·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箱：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Formation of
Important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erms*** (in Chinese)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17563-1-2

Editors: Chu Man-ling, Cheung Chi-wai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致 謝

在本論文集即將付印之際，我們感慨萬千。雖然，這是十年來我們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 (以下簡稱「數據庫」)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觀念演變的主要論文的匯編，但是，正如我們在不同場合多次說過的那樣，這是一項探索性很強的研究工作，如果沒有研究經費的持續投入，如果沒有在不同時期、由不同人員組成的研究小組的共同努力，這一論文集的結集出版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以下的感謝，篇幅雖然已經相當長，但仍可能有缺漏。

首先，要感謝資助如下一系列研究計劃的機構：1997年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2000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 (RG018-D-99)”；200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資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年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2004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的：“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Politic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 (RG019-P-03)”；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2004-2005) 資助的：“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Ideas (1840-1924)”；特別是2006年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為期兩年的：“A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1830-1924) (CUHK4554/06H)”，本論文集可以說是這項研究計劃的最後成果。這幾個研究計劃均由金觀濤擔任研究主持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劉青峰作為主要合作者；此外，先後參與這幾個課題的合作者還有：

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台灣國立暨南大學周昌龍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森時彥教授、韓國延世大學白永瑞教授。在此，我們要再次感謝上述資助機構的持續資助和合作者的無私奉獻。

1997年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後，我們旋即與復旦大學歷史系章清教授組成研究小組，展開了第一階段的研究。我們選擇了新文化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團體或政黨的十二種雜誌，按統一規格，對每個期刊作出規範性意義分析。當時，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師生擔任期刊研究的人員包括：張謙《甲寅》，孫青《新潮》，唐雲松《每週評論》，汪乾明《嚮導週報》，章紅《建設》，黎建軍《星期評論》，金燕《少年中國》，趙文斌《努力週報》，孫青、曲偉《現代評論》，楚永全《解放與改造》，苑學武《醒獅》；在香港中文大學，則是由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戚立煌先生和吳嘉儀小姐承擔《新青年》的分析。在這一階段，除周成海先生、屈大成先生曾短期參加過查證文獻外，黃庭鈺小姐繼吳嘉儀小姐成為得力的研究助理。除了感謝以上所有早期參與研究計劃的人員外，還特別要說一下戚立煌先生。戚先生長期在中國大陸從事文史研究工作，退休後來到香港，主動申請參與我們的研究計劃。當時，「數據庫」尚未建或初建尚未可使用，他以深厚的文史功力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帶領研究小組中的年輕同事，用傳統方法一絲不苟地分析例句。讀者可以在本論文集看到，差不多每種關於《新青年》的分析統計，都是由他做出的。2005年，近70歲的戚先生依然是中大籃球隊的活躍成員，但卻因一次醫療事故而去世，令我們深感意外和痛心。

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研究後，我們意識到，基於個別研究者的分析，研究結果總是會出現個性差異。為了使觀念史研究有更可靠的基礎，我們意識到必須要依靠全文錄入電子文本作為分析對象，因此，必須建立電腦數據庫。2001年初，劉青峰開始策劃建立「數據庫」；當時，我們尚不清楚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系統工程。但是，十分幸運，我們在以下三方面都得到富有成效的支持與配合。

先說系統設計。2001年決定建立「數據庫」時，恰好北京工業大學電腦學者孟大志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參與古文獻電子計劃，「數據庫」最早的設計構思就是與他商議決定的；他的學生張丙奇先生和陸薇小姐則承擔了編寫程式的工作。由於當時估計「數據庫」所收文獻最多不過是幾千萬字，到2003年，這一初始設計就很不適用了，查詢速度和文獻導入都出現問題，系統設計遂成為計劃實施的瓶頸。恰好，這年夏天我們結識了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年輕的黃勇和黃磊兄弟。從那時至今，黃勇先生就成為「數據庫」系統的總設計師。黃勇先生有豐富的電腦應用程式設計經驗，但要了解並按

照史學研究者的需要來編程，對他來說也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從那時起，黃勇先生負責重新設計並不斷改進系統的各項功能，以及解決系統運作中發生的各種故障。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電腦技術員李潔兒小姐，也在系統設計的各個階段，一直熱情協助我們解決技術溝通、測試等問題，默默做出奉獻。

再說入庫文獻的選擇。1999年夏，吳通福先生作為金觀濤和中文大學哲學系合帶的博士研究生來到中大。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他是一個極之少見的、自小就熟讀傳統經典並對明清儒學文獻十分熟悉的年輕人。2001年，建庫工程啟動後，由通福負責文獻收集和標引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決定第一批約七百萬字入庫文獻目錄時，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和姜義華教授也分別提供了寶貴意見。2002年通福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又留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兩年，擔任研究助理和博士後研究員。2004年夏，吳通福博士到江西財經大學就任教職，仍繼續參與文獻收集和分析工作。也就是在這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們結識了魚宏亮博士。魚博士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修讀古代文獻專業的，令我們意外的是，一般說來，選擇這一專業的人不會對高科技感興趣，但魚博士恰恰是一個例外。2004年夏天起，宏亮以他在古文獻和電腦數據庫兩方面的知識，參與建庫工程，成為研究團隊的重要成員，負責文獻與系統管理兩方面的工作。在黃勇與宏亮的很好配合下，系統功能做出兩次大幅度改進。

在建庫工程中，除了系統設計和文獻收集處理外，還有大量瑣碎繁雜的行政事務，如與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合作者或機構、公司之間簽訂並履行合約，保持日常聯絡，大量來往數據、圖片文檔的收發驗收及管理，課題報告的準備和總結等等。這些事務，先後由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黃庭鈺小姐、陳美真小姐、葉子菁小姐擔當管理。她們的敬業和認真細心的工作態度，保證了建庫工程的順利進行。此外，林立偉先生以他良好的中英文訓練，協助做了大量翻譯工作；增田真結子小姐曾協助了日籍文獻的調研；林翠盈小姐、陳露君小姐則在文秘方面作出支援。除葉子菁小姐至今仍擔任「數據庫」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外，我們沒有忘記並感謝以上幾位已先後轉職的同事。

2006年9月，最新一個研究計劃展開之時，我們就決定利用擴大至一億兩千萬字的「數據庫」來驗證並重新檢視早期和中期發表的論文；同時還要運用「數據庫」，對我們已做過的中國近現代十大觀念研究所涉及的近一百個政治術語做一簡單整理。這兩項工作，不僅是出於完成本課題的需要，也是用我們初步總結出的方法論，對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驗證。一年來，高超群先生和魚宏亮博士與我們組成研究小組，投入了這一艱鉅的挑戰。超群負責做例句分析和統計，他每天要面對並處理從「數據庫」中

提取的數千甚或上萬條含關鍵詞的例句；宏亮除了日常文獻和系統管理工作外，每當發現問題，就要及時利用「數據庫」或從原始文獻中查找解決。他們日復一日地從事這種枯燥、但又是最基本的分析整理數據工作，使得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重新改寫這些論文。與此同時，超群還完成了九十餘個相關政治術語詞意分析的編寫，作為本論文集的附錄二。

最後，本論文集的編輯出版，還要特別感謝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幾位同事。由於本論文集涉及的文獻量相當大，圖表也很多，校對、編輯和排版工作量就非同一般文章了。每當我們改定一篇文稿，就由朱敏翎小姐、張志偉先生細心編輯，再由張素芬女士一絲不苟地排版製圖。用這種流水作業方式，他們在編輯《二十一世紀》每期稿件之餘，完成了本論文集的編排。因此，可以說，這本論文集不僅是我們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時期與合作者的研究心得，也同時凝結着我們對先後與我們共事的同事之間相處的美好記憶。

金觀濤、劉青峰

2008年4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 錄

致謝	ix
導論：為甚麼從思想史轉向觀念史？	1
上篇：理論探索	25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 ——中國文化合理性論證以及正當性標準的思想史研究	27
二 試論儒學式公共空間 ——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思想史研究	69
中篇：觀念變遷和術語	97
三 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起源和演變	99
四 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初探	147
五 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 ——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175
六 從「天下」、「萬國」到「世界」 ——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	221
七 從「共和」到「民主」 ——中國對西方現代政治觀念的選擇性吸收和重構	247
八 從「富強」、「經世」到「經濟」 ——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	283
九 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 ——知識體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史研究	319
十 革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	357

下篇：方法論	391
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識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 ——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	393
十二 「科舉」和「科學」 ——重大社會事件和觀念轉化的案例研究	411
十三 歷史的真實性 ——試論數據庫新方法在歷史研究的應用	425
附錄一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 文獻目錄	463
附錄二 百個現代政治術語詞意彙編	479
附錄三 有關統計分析的討論	573
附錄四 導論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	577
參考書目	589

圖表目錄

圖1.1	「公理」、「公例」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54
圖1.2	「公理」+「公例」及「真理」的使用次數 (1860-1930)	62
圖2.1	「國民」、「個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湧現 (1898-1915)	82
圖2.2	「經濟」、「立憲」和「共和」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85
圖3.1	「權」、「權利」的使用次數 (1864-1915)	112
圖3.2	「利權」、「權利」的使用次數 (1864-1915)	114
圖3.3	「權利」、「個人」的使用次數 (1864-1915)	127
圖3.4	「權利」、「義務」的使用次數 (1864-1915)	130
圖3.5	《新青年》中個人、群體和國家「權利」的使用次數	141
圖5.1	「群」、「社會」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190
圖5.2	清末知識份子政治性社團成立年代分布 (1895-1911)	205
圖6.1	「天下」、「民族」和「國家」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237
圖6.2	「萬國」、「世界」和「國際」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241
圖6.3	「世界」、「世紀」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243
圖7.1	「民主」、「民政」的使用次數 (1864-1915)	257
圖7.2	「民主」、「共和」的使用次數 (1864-1925)	263
圖7.3	《新青年》中「共和」、「民主」的使用次數	272
圖7.4	《新青年》中「民主」、「民治」和「德謨克拉西」的使用次數	278
圖8.1	「富強」、「經世」和「經濟」的使用次數 (1860-1915)	299
圖8.2	《新青年》中「經濟」、「社會」、「階級」、「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使用次數	310
圖9.1	「博物」、「格致」的使用次數 (1860-1895)	328
圖9.2	「科學」取代「格致」的歷程 (1894-1915)	335
圖9.3	《新青年》中「技術」、「製造」、「工業」和「生產力」的使用次數	355

圖10.1	「革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義結構.....	359
圖10.2	「革命」及「維新」(含「改革」、「改良」)的使用次數(1890-1926).....	374
圖10.3	「革命」、「平等」和「獨立」的使用次數(1890-1927).....	378
圖11.1	《新青年》中「世界大戰」、「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華盛頓會議」 和「巴黎和會」的使用次數.....	400
圖12.1	「學校」、「學堂」的使用次數(1860-1924).....	418
圖13.1	客體不能獨立於主體存在時的主客觀關係.....	428
圖14.1	「國民」、「個人」各年萬字中的使用次數(1898-1915).....	575
表1.1	漢代和漢代以前文獻中「理」字的典型用法.....	33
表1.2	漢代和漢代以前文獻中「理」字的意義分類統計.....	35
表1.3	《莊子注》和《四書章句集注》中「理」字的用法.....	38
表1.4	《佐治芻言》中「理」字的用法.....	45
表1.5	《新青年》等五種雜誌中「公理」的意義分類統計.....	57
表1.6	《新青年》等五種雜誌中「公例」的意義分類統計.....	59
表1.7	《新青年》等五種雜誌中「真理」的意義分類統計.....	61
表1.8	《新青年》等五種雜誌中「理性」的意義分類統計.....	65
表2.1	自漢至清中葉十三種文獻中「公」字的不同含義及使用次數.....	77
表3.1	道德化程度及其相應的觀念和觀念系統.....	106
表3.2	《鹽鐵論》中「權利」的用法.....	107
表3.3	《萬國公法》中「權利」的用法.....	109
表3.4	「權利」、「利權」的用法(1883-1900).....	113
表3.5	「權利」的用法(1901-1911).....	120
表3.6	《新青年》中「權利」的意義.....	134
表4.1	「個人」的意義分類統計(1898-1915).....	156
表4.2	「個人」、「國民」和「個人主義」的用法(1900-1915).....	158
表4.3	《新青年》中「個人」的意義分類統計.....	167
表5.1	「群」在古代文獻中的用法.....	186
表5.2	「群」在古代文獻中的意義分類統計.....	187
表5.3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中「群」、「社會」的用法(1901-1904).....	192

表5.4	《新青年》中「社會」、「社會主義」的使用次數.....	213
表5.5	《新青年》中「社會主義」的詞義類別及評價.....	214
表7.1	「民主」的意義分類統計(1864-1915).....	253
表7.2	《新青年》中「民主」及其相關詞彙的意義分類統計.....	277
表7.3	《新青年》作者使用「民主」及其相關詞彙時的價值取向.....	280
表8.1	四種清代經世文編中「自強」、「富強」、「經濟」和「生計」的 使用次數及典型例句.....	294
表8.2	《新青年》中「經濟」的意義分類統計.....	308
表9.1	1910年梁啟超對「常識」和「專門學識」的區分.....	340
表9.2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中「常識」的用法.....	344
表9.3	《新青年》中「常識」的用法.....	345
表9.4	《新青年》中「科學」的詞意變化.....	352
表10.1	二十五史和十三經中「革命」的用法舉隅.....	359
表10.2	「革命」的意義分類統計(1896-1911).....	366
表10.3	《新青年》中「革命」的意義分類統計.....	381
表11.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項大事.....	398
表14.1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各年文獻字數.....	576

導論：為甚麼從思想史轉向觀念史？

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經驗的檢驗，那麼便只能以觀念史作為自己的基礎。甚麼是觀念？觀念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史有甚麼不同？本論文集力圖通過對中國當代觀念形成的考察來表達如下信念：我們正在穿過語言的叢林，抓住歷史洪流中變遷的思想。

一 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

今天中國人有一種不知往何處去的文化迷惘，造成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是我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思想狀況，就必須去研究其形成過程。然而，當代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卻在於：它是一系列意識形態變遷及解構的產物。今日盛行的價值系統，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啟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啟蒙運動的興起，則源於對二十世紀革命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澤東思想解構的結果。回顧二十世紀中國，自鄒容吹響革命號角拉開歷史幃幕，革命意識形態足足統治中國達八十年之久。中國經歷了「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革命意識形態終於解體。今天的年輕人，對爺爺輩經歷共產主義理想幻滅的痛苦，對父輩經歷階級鬥爭和文革後的沉痛反思，已毫無感覺。大多數年輕人或滿足於專業追求，或沉浸在消費社會中尋求刺激，再沒有歷史的沉重包袱。確實，當一個龐大、長期籠罩一切社會生活領域的思想體系解體時，在社會對思想的普遍冷漠中，人們已沒有興趣去關注思想文化如何暗中變遷及其整體結構瓦解後的殘存形態。

對於上述過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們則更喜歡用打爛的萬花筒作比喻。兒童時看萬花筒，每轉一個角度，就會出現千變萬化、色彩斑斕的圖案；如果打碎萬花筒，倒出來的是一堆有色碎片。當革命意識形態有效時，正如巨型萬花筒在轉動，圖景氣象萬千，不斷組合出魅力世界。告別革命意識形態正如

萬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們對價值理念完全失去興趣。但作為思想史研究者，卻必須去考察萬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現的。萬花筒中的圖像雖然有趣，卻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組合而成的。沒有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構意識形態，亦不會發生意識形態的迅速變遷。要理解革命意識形態解體後的思想形態，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組成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意識形態建構和解構、仍然存在而且相對穩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國當代文化中確實有這樣的東西嗎？如果存在，它又是甚麼呢？

我們發現，這些作為意識形態瓦解後的思想碎片不僅存在，而且其形態是相當穩定的，只是人們熟視無睹、習以為常罷了。它們就是當代中國人用於理解現代世界和社會的基本觀念。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一組基本觀念之上的思想系統，正是這些基本觀念建構了二十世紀國、共兩黨不同的意識形態，並在1920年代以後指導着中國人的大規模社會實踐；而意識形態的解體，並不意味着組成系統的基本觀念的消失。舉幾個例子。「告別革命」的說法，只不過反映出革命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們心目中所佔的地位）發生巨大變化（這是革命意識形態解構的結果）；但革命觀念（對革命是甚麼的理解）本身，在今日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差別並不大。其他中國人熟悉的觀念，如個人、權利、社會等，也不是如此麼？

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解體，使得對某種觀念在當下的價值評判（重要性）可能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但對該觀念的核心意義和功能的理解並沒有隨之而大變。意識形態的解體，在很多時候只是觀念之間關係的變化。以科學觀念來看，今天中國領導人講的科學發展觀，是用科學來論證經濟發展的正當性，這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科學來論證革命的正當性，與1920年代新知識份子建立科學的人生觀相比較，變化的只是科學論證的對象，而不是對科學本身是甚麼以及對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說，上述種種重要觀念的核心價值和功能，從新文化運動到今天仍保持了它們的相對穩定性。

總之，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基礎以及指導社會行動的綱領，是建立在一組普遍觀念之上的。意識形態的解構，意味着其整體意義的消失（當然有時也包括某些觀念的變化），但其組成要素大多仍然存在。嚴格地講，所謂觀念系統的解體，只是組成意識形態的基本觀念的重要性排序和它們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以及用這種關係來論證的意義系統之消失。作為其組成要素的觀念則被游離出來，繼續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為了認識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其解構後的中國當代思想狀況，就有必要研究這些觀念碎片。這樣，我們就必須實現研究視野的轉換——這就是從思想史轉向觀念史。

二 觀念是甚麼？

顧名思義，所謂觀念史就是去研究一個個觀念的出現以及其意義演變過程。但是觀念 (idea) 又是甚麼呢？「觀念」一詞最早源於希臘的「觀看」和「理解」，在西方十五世紀就用該詞表達事物和價值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也指人對事物形態外觀之認識；十七世紀後涉及構思過程。¹ 其實，只要驅除西方柏拉圖主義 (Platonism) 和德國觀念論 (German Idealism) 給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觀念」並不難定義。簡單說來，觀念是指人用某一個 (或幾個) 關鍵詞所表達的思想。細一點講，觀念可以用關鍵詞或含關鍵詞的句子來表達。人們通過它們來表達某種意義，進行思考、會話和寫作文本，並與他人溝通，使其社會化，形成公認的普遍意義，並建立複雜的言說和思想體系。

一旦觀念實現社會化，就可以和社會行動聯繫起來。我們知道，任何社會行動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合成，需要眾人進行價值和手段的溝通。沒有普遍觀念，由個人的行動組織成社會行動是不可思議的。弗耶利 (Fouillé) 曾這樣描述觀念與社會行動的關係，他說：觀念是「我們的感覺和衝動所呈現出的知覺形式；每個觀念不僅涵蓋一種智力行為，而且涵蓋知覺和意志的某種特定的方向。因此，對於社會亦如對於個體一樣，每個觀念均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愈加趨向於實現其自身的目的」。² 這裏，講的正是普遍觀念在組織、協調各種人實現自己目的 (行動之動機) 方面不可缺少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講，社會行動可以視為觀念的實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層面進一步明確「觀念」的定義。第一，因為觀念是用固定的關鍵詞表達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確定，可以具有更明確的價值方向。與觀念相比，思想顯得較為抽象、含混，它可以純粹是思想者的體驗和沉思默想；觀念則必須是可以用相應關鍵詞或含該詞的句子來表達。因此，任何觀念的起源、社會化和演化，也就是表達該觀念的相應關鍵詞的起源、傳播和意義變化。當然，思想亦離不開語言，但它和語言 (特別是關鍵詞) 的關係遠不如觀念明確簡單。以往，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以某一人物、某一著作或某一流派的分析為基礎；而且，因思想和語言之間的關係不那麼明確，不同的研究者對同一文本的分析，往往會得出相差很大的結論。觀

1 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頁167。

2 轉引自伯瑞 (John B. Bury) 著，范祥燾譯：《進步的觀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1。

念則不同，它在社會化後具有普遍意義的確定性。正因為如此，人們可以憑藉若干觀念建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

第二，因觀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確的價值(行動)方向，它和社會行動的關係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很多社會行動如革命、改良、立憲、啟蒙，可以視為以某一個或幾個觀念指導下產生的。或者說，在社會行動中，觀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動者想像(在心裏預演或計劃)或事後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觀念可以視為社會行動的組成部分。

一旦搞清「觀念」的定義，我們就可以討論它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了。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常把社會制度正當性的根據和指導社會行動的思想體系稱為「意識形態」。人類生活中的社會行動十分龐雜，而要將各種社會行動互相協調，組織成整體的改造社會的行動，其前提是需要把各種不同的社會行動的觀念整合起來，互相協調，形成某種具有整體結構的觀念系統。這種觀念系統，就是意識形態。具有整體結構的意識形態，可以指向更高層次的目標，轉化為大規模改造社會的行動。只有在這一角度來看，才能理解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它和改造社會的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

由此可見，觀念是組成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的基本要素。這一點，甚至可以在「意識形態」的詞源上得到證明。從構詞法上看，「意識形態」(ideology)這個詞的本意就是觀念學，即和觀念系統形成或有關觀念推演邏輯的學問。這樣一來，研究某種政治意識形態，便首先需要剖析該意識形態是由哪些基本觀念構築而成的。此後，還需要認識該意識形態中各種觀念之間獨特的關聯方式，也就是理解意識形態的內容和結構以及其正當性論證模式。而意識形態的解體，亦意味着組成它的各種觀念游離出來，成為各自獨立的碎片。

眾所周知，中國人是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接受馬列主義，進而將馬列主義中國化，後來演變成毛澤東思想。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思想開始解體。只有了解當年中國人是憑藉着哪些重要觀念，來建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中國現代意識形態，才能理解這些意識形態的變遷及其解構以後的中國思想狀態。那麼，組成這些意識形態的主要觀念是甚麼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說法，但我們認為，下列觀念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最基本要素，它們包括：科學、民主、真理、進步、社會、權利、個人、經濟、民族、世界、國家、階級、革命、改良、立憲等等。困難的是我們如何在流變的大千世界中把握它們，特別是這些觀念如何起源、演變，並在最後可以互相整合，形成宏大的革命意識形態？

三 關鍵詞研究和數據庫方法

我們認為，觀念作為意識形態的組成要素，比意識形態更基本。這樣，只有釐清觀念的起源，才能理解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演變。觀念作為用關鍵詞表達的可社會化的思想，研究其形成，就必須去探討表達該觀念的關鍵詞的出現，並分析其在不同時期的意義。這是一項相當基礎性的經驗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通過思想史來認識觀念，大多依靠公認的重要文本（主要是個別思想家和代表性著作），來分析某一時期某些觀念的形態，這樣，觀念史只是思想史的分支。一直到1990年代，隨着歷史文獻向數碼化的方向發展，情況才發生變化。原則上講，研究者可以通過建立包括過去所有文獻的專業數據庫，採用數據挖掘（data mining）方法，把表達某一觀念所用過的一切關鍵詞找出來，再通過核心關鍵詞的意義統計分析來揭示觀念的起源和演變。從此，觀念史就可以從思想史研究中分離出來，成為思想史研究的經驗基礎。過去十年，我們一直在進行有關觀念史研究的嘗試，並認為它與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有如下差別：

第一，研究的基本單位不再是文章和人物，而是句子。我們知道，以往思想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是如何選擇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以及正確解讀文本，從中抽象出觀念（思想）的理念形態。由於對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選擇的差異，再加上文本解讀本身的複雜性，使得研究者在如何理解歷史文本方面有着極大的分歧，解釋可以是比較任意的。也就是說，以往的研究方法帶來了不可判定性。現在，我們的研究基本單位不是文章，而是文章中含有某一個關鍵詞的句子。雖然，在很多時候判斷某一關鍵詞在某一句話中的意義時，必須去看上下文，但根據句子來判斷某一關鍵詞的意義，具有相當大的客觀性；而且，從句子來區分關鍵詞有多少種意義類型，比從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來判斷其觀念形態要準確得多，這就使得以句子為中心的觀念史研究的可靠性大為提高了。

第二，以往，以人物和代表著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局限了討論範圍，很難提供對該觀念如何起源、是否普遍、是否流行的檢驗。如果以句子為基本單位，就可以將數據庫中某一歷史時期使用該關鍵詞的所有句子搜尋出來，在對數以千計甚至是數以萬計的句子分析中，抽取關鍵詞的意義類型，並分析這些意義類型中哪些、在哪一時段是普遍使用的以及如何變化。由於分析對象是確定的句子，觀念演變就成為可驗證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由於存在文獻導入多寡、研究者判句時的理解等問題，仍可能產生誤差，但總的來看，研究結果並不會因為研究者的不同而出現很大的歧義。

只要承認上述兩個簡單前提，一種和以往思想史(觀念史)研究不同、以關鍵詞分析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初步確立了。根據我們的經驗，運用這一方法分為如下幾個基本步驟。

首先，是尋找和選取表達某一觀念的關鍵詞，³並利用數據庫檢索這些詞彙，統計其按年代的使用次數。接着，是提取所有相關例句，再由研究者解讀每一個例句，以確定該關鍵詞按年代分布的各種意義類型及變化。第三步，研究者以此作為基本素材，再做出分析研究。當涉及觀念跨文化傳播時，除了必須注意該觀念在原有文化中關鍵詞的意義演變外，還必須分析中文裏用於表達外來觀念的關鍵詞的原意，研究人們何時以及為何要用該詞表達新觀念。如果該詞是翻譯時新造的詞彙，則需分析該觀念在何時傳入以及定名和普及的過程。在研究表達外來觀念的關鍵詞時，不論是使用中文原有詞彙還是新造詞彙，都必須比較該關鍵詞的意義在歷史上的變化；確定某一時段其主要意義以及分析它們與相關傳統觀念的差異。除此以外，還可以通過對文本深度挖掘出的其他數據，如文本所涉的人物、事件、學說、徵引文獻等，建立規範性意義分析的數據庫，研究上述變項對觀念變化的影響。

必須指出，在上述幾個研究步驟中，電腦只是在前兩個技術性環節發揮作用，它能按年代快速提取大量文獻中研究者所需的例句。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仍是研究者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數據，結合歷史背景和文本結構分析，概括出某一時代某一普遍觀念的理想類型，這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換言之，如何對統計分析結果作出更為細緻深入的解釋梳理，從而勾勒出觀念演變的線索，仍然要依賴研究者的創造和綜合能力。不斷擴充數據庫文獻的總量和改進系統功能，始終只是研究的輔助工具。運用數據庫方法的貢獻，主要表現在觀念史研究從此可以突破以往用個別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的局限，並使得思想史研究成為可以檢驗的。

四 實證研究的發現：當代觀念形成的三階段

自從1993年出版《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以後，我們就轉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並於2000年完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該書的討論範圍只及於1895年。在寫作這本書的過

3 選取關鍵詞時，要重視歷史上是用甚麼詞，它往往與當今通用的詞不一樣。